



0005691

开放与封闭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
取向及其当前流变

● ●
封祖盛 林英男
河北人民出版社





开放与封闭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
取向及其当前流变



开 放 与 封 闭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
取向及其当前流变
封祖盛 林英男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2.25印张 300,000字 印数：1—15,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C86·1450 定价：2.90元

ISBN 7-202-00007-5/G·2

目 录

导论.....	(1)
---------	-------

(一)	(1)
-----------	-------

 绪言

 文化与价值

 社会价值和社会价值取向

(二)	(10)
-----------	--------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再认识

 中国革命必须补课

 历史的例证和结论

(三)	(22)
-----------	--------

 和谐、进步和稳定

 中国传统社会表层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泛家族主义”和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

(四)	(36)
-----------	--------

 开放进化的社会价值观的提出

 “中庸”、“平衡”和社会稳定态

 封闭近平衡社会系统的基本特点

 开放非平衡社会系统——发展演化的新方向

 挑战、应战和展望

一、外交价值取向

我族中心，自给自足——平等合作，对外开放……(58)

封闭自足和被迫开放

再度封闭和自觉开放

二、目标价值取向

天下太平，长治久安——改革创新，发展进化……(87)

钉在固定点上的传统社会目标

修、齐、治、平一体化

怕乱求稳，反对改革——千秋功罪

改革发展与安定团结——传统社会目标价值观的改造

三、国家价值取向

天下一统，定于一尊——百家争鸣，多元稳定……(114)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统和道统

历史的奇迹和代价

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多元稳定

从封闭一元结构走向开放多元结构

四、家庭价值取向

家族至上，家外有家——自尊自立，协合群体……(152)

传统文化的家族主义

封建大家庭的社会功能

当前城乡家庭观念的嬗变

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流衍种种

家族主义精神的改造和巨大潜能

五、认知价值取向

唯古是法，以老为宝——承传整合，革故鼎新……(187)

观念的圣化——经典化和制度化

封闭的农业社会——一个老人统治的世界

历史的承传和停滞

新的崇古观念形成——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

观念的俗化和理论的更新

崇老观念的变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

六、政治价值取向

为政以德，德主法辅——德法相辅，二者并重……(214)

德主刑辅和任人唯贤

德政与人文化成

德治的功过利弊

从为政以德到德法相辅

从重德轻才到德才兼备

七、成就价值取向

官为自体，读书做官——崇尚知识，服务社会……(252)

立功、立德、立言背后的本体价值

一元化的社会成就价值——读书做官

“大一统”封建专制制约的结果

根基深固、积重难返的“官为自体”价值观

读书和做官，知识与权力

八、经济价值取向

不必患寡，只患不均——注重效率，兼顾公平……(283)

民本、均平和稳定

揭竿斩木——杀尽不平方太平

重农抑商，维护平衡

均平价值观的胜利——“穷社会主义”的分配

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注重效率，兼顾公平，鼓励竞争

九、道德价值取向

偏重人伦，以情为贵——重视人伦，遵守公德……(319)

人伦为中心，情意为主线的道德价值

人情所至——协合力和破坏力

文化道德价值重建的曲折历程

十、人生价值取向

保存天理，灭绝人欲——尊重个性，进取向上……(346)

“存天理，灭人欲”人生价值取向的形成

中西人生价值不同原则探讨

中国传统人生价值取向的主要特点

得失利弊和劣根性

当前人生价值取向流变趋势

附：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导 论

(一)

绪 言

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曾经把人类六千年的历史分成二十六种文明，其中包括已经死亡的十六种文明。在汤恩比看来，各种文明都经历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五个阶段；文明社会遇到的一系列挑战和成功的应战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文明的成长没有必然性，在文明发展的任何一点上，如果应战敌不过挑战，衰落就来到了；在衰落的混乱苦难时期，如果挑战出现而没有遇到应战，如果同一个挑战不断反复而应战一再失败，那便是文明瓦解的征兆。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意汤恩比的历史哲学体系——把生物学的简单原理应用到历史学中来是危险的，尽管汤恩比能不计成败地从事这一冒险的事业，值得称道——我们于此不过是借用关于文明衰落期的挑战和应战的比喻。汤恩比反对历史的决定论和循环论，他认为循环论将历史变成白痴讲述的毫无意义的故事，而在文明的衰亡中则可能产生新的文明。^①

中国古代文明在突然被抛到近代世界新的环境时出现的震荡、混乱和痛苦已人所共知。而从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

^① 参阅汤恩比：《历史研究》中译本，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0年版；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封闭的木排铁链开始，中国古代文明无疑是衰落了。它面临着类似汤恩比所说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有经久不息的内战，有遭到亡国灭种危险的外患。但是，时至今日，一直没有改变的反复出现的挑战，是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现代”是个相对时间概念，因此“现代化”也就不断有新的内涵。随着世界经济、文化或慢或快的发展，现代化的标准也就不断提高。

中华民族早就奋起应战了，掀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浪潮，努力把古老的中国推上现代化的道路。不少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历史曾经好几次地给中国提供了机会，朝现代化的目标迅跑，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都错失了良机，有时甚至造成严重灾难。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不断有些进步，有时进步还较大，但总的说是十分缓慢，非但不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和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和失望，这便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悲剧。西方古代的悲剧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开展，英雄手持利剑倒在命运的必然性上，总是以疑问号结束。而现代中国的悲剧在心灵、社会和自然中开展，显示出这是一个多么需要“英雄”的民族，而正走向非英雄的时代，然后总是以惊叹号结束。

以毛泽东同志为伟大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诞生。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以后，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新的姿态开始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使已经萎靡不振、濒于崩溃的中国文明重新获得了生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光辉成就，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在世界上任由列强欺负的日子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并未

能按照人民所希望的速度前进，有时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在进入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多年，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曾经一度缩小的距离又趋于扩大。历史给中国人民戴上的贫穷、落后的帽子终不能彻底扔掉。

如今，沉重的历史灾难又一次惊醒了东方的睡狮，在随机因素明显增强的现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振兴中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虽然不一定是最后一次机会，但这样的机会肯定是不可多得了。

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而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无法尽快实现现代化，那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距离固然无法缩短，就是一些原来比我们落后的国家也可能把我们抛在后面。

我们仍然面临着全面的历史挑战。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说早已随着甲午风云和北洋舰队的覆没消沉于汪洋大海，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中。“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科技和价值的同步改革发展及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是中华民族的挑战，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新文明生成的催化剂，是民族希望之光，创造之火。唯有改革，才能唤醒民族的五千年光荣和耻辱、梦想和苦难的记忆；唯有改革，才能促成民族的新的历史反思，推动古老的文明走向现代世界。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二者同时并举，不可偏废，这便是中国胜利地走向未来世界的根本保证。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伟大的改革运动，学术界几乎是以“继绝学”的方式重新开始了中断三、四十年的国学研究，或称文化综合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观念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综合性评价。这

新的历史条件便是，我们已经取得民族独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很不完善），已经进入和平经济建设和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新阶段，人们思想正在日益解放，思想一元化统制将要变成历史陈迹。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收无数经验教训以后，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冷静地重新开始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这种评价将不同于救亡图存、饥不择食的时代，以及急风暴雨和战火纷飞的大革命时代所能做出的评价。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学术界有可能在新的知识基础上调整评价的角度，创造和尝试新的方法，以求得出新的富有活力的结论。这一切虽然仅仅是开端，还处在探索阶段，但如果历史的苦难能给予我们新的知识，这就可能成为文明进步的新因素，就可能促成全民族有效的应战。

文化与价值

人们曾经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文化”下过多种多样的定义。有人统计过，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六十个之多。^① 这本小书讨论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得不对“文化”概念规定自己的内涵。我们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般是指人类的民族风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哲学和价值的总体。或者表述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及其结果的相互作用的进化的整体。

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中国文化，而且限于中国文化中社会价值观念这一部分。三十多年来，作为与文化和哲学相联系的价值概

①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等著：《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罗列了1871—1951年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一百六十多种。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香港文星书店出版）一书中对一百六十多种定义作了部分介绍。

念曾经长时间不为流行，因此，关于“价值”的定义就成为我们必须讨论的一个前提。

从哲学的角度说，价值是相对于事实而言的，事实认识也就相对于价值判断。最早从哲学上提出关于价值与事实两种知识的区分的，是十八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1711～1776年）。他认为关于事实的知识，从经验观察得来，而且可以由经验来验证，所以是可靠的；关于价值的知识，如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则不从经验得来，不能由经验来验证，所以不是知识，也无所谓真理和谬误。这当然是一种建立在古典的主客观割裂的经验论上的区别。我们区分事实和价值，从理论上认为事实以经验为基础，而价值则以伦理情感和审美情感为基础。这是一种特定思维方式即形式逻辑方法的需要。它以简单因果律和线性方法对事实和价值进行必要的区分，因而也容易造成割裂。西方现代哲学长期存在水火不相容的科学哲学和价值哲学，各是其是，非其所非，从思维根源上显然与上述割裂有关。但是，今天这两大流派哲学也似乎从互为消长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文化哲学的日益被重视体现了这种趋向。

《等待戈多》的作者、著名的荒诞派戏剧作家贝克特曾经说过：对人类的状态，从人的角度看，一切都是痛苦的；从宇宙的角度看，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所说的“痛苦”就是价值判断。在人类未出现之前，当然没有人类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类的自我意识，也没有“人的角度”。他所说的“人的角度”，就是西方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所以，价值首先是人和社会自我意识的产物。但价值产生的社会前提正是人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条件和方式，经验和所认识的事实（包括科学技术）；反过来，作为人的一种活动的对于事实的认识，即使是建立在实验和数理基础上的精密科学，在设计、思维、推理和预测方面，价值也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不同的作用。伟大的科学家都相信宇宙是齐一和谐

的，格式塔心理学揭示了知觉过程的主观构造性特点；任何自然科学理论的建立都免不了必要的假定：欧氏几何学中的点和线，力学中的质点和初始条件，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还有，价值和美学的观念如何影响科学研究，甚至影响未来社会的规划，这都是今天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些都说明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虽然有不同的特性，可以说，事实判断重视感觉经验和客观外在世界，在逻辑上认为评价对象不以人的意志、态度为转移，价值判断则重视情感和态度，偏重主观意识，但是事实的客观性和价值的主观性只是相对的必要的区分。

至此，我们可以试图对价值概念下定义了，尽管这是一个难度很大而且至今仍然十分混乱和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

价值是人类试图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概念，这种概念始终存在于人类的活动中。人类的价值观念规定和调节着人类的行为。

价值是主要以伦理或审美情感的满足为基础的评价事物的标准，关于这种标准的思维就是价值观念。如前所述，价值评价也以事实认识为前提，但总是潜在的间接的前提；价值评价也渗透了事实认识，但后者总是融于前者之中。价值的评价总是以伦理或审美的情感满足为最后依归。这里所说的“情感”有别于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因为这二类价值是“价值”中较纯粹和典型的价值。而事物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实用上的需要，即有用性和功利性的量度，一般来说，属于事实判断。如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或者其延伸，就不同于我们讨论的价值概念（按照中国古代儒家的义利观，这就是“喻于利”，不是“喻于义”，构成“小人”与“君子”之分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有用性的“价值”概念。

世界上不存在无价值包含其中的文化。价值不仅是人类文化组成部分，它为文化质料的组织提供了各种潜在的罗聚方式，也

是内在地制约影响人类进程、民族命运的文化深层结构。因为人类不仅根据对物质的需求，而且以美的尺度和伦理的标准创造着历史，因此，价值规范和调整着人类的行为。中国文化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华民族是高度重视价值的民族。汉语中的“是非”一词，就不仅是指事实认识，更多的是指价值判断。这当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其优点和弱点。在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今天，中华民族弱于事实判断的传统，严重地阻碍着法制的建立和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巨大的历史制约，也可能使中国走上一条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要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化，必须深入地去了解它的价值系统。离开价值去谈中国文化，就会构成遗憾。离开价值去谈现代化，我们就会受到历史的嘲弄。

社会价值和社会价值取向

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如果我们通过运用逻辑或定量方法尽量排除伦理和美学情感的干扰（这实际上是指伦理或美学情感渗入的一定程度，所以说“尽量排除”），归纳和分析大量事实，加上演绎和综合，或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得出评价标准和认识的结论，这属于事实认识。这种标准和结论就不属于“价值”。相反，如果我们根据诸如宗教情感、愿望和理想，或直接从伦理要求和审美尺度，或采取逻辑方法，但总是以伦理或审美的情感为基础，得出评论标准，这就属于价值。而关于社会以及社会的各个侧面或中心问题的这类评价标准，就是“社会价值”。它所涉及的可以有社会的内外环境、社会结构、社会目标、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的评价标准。这些评价标准的综合就是“社会价值”。

什么是“社会价值取向”?可以说,它首先是社会价值的主要倾向,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个主要倾向当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代表。其次是社会历史过程可实际形成的结果所呈现的倾向,这种实际的倾向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社会。具体地说,应注意如下几个界限:

第一,价值观念作为思想家的理论形态,其创始人与历代继承者的区别。如研究资料表明,先秦的孔子对妇女的态度与秦汉儒学和宋明理学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与统治者的价值观念的距离。如董仲舒关于社会结构的价值观念与汉武帝的距离。虽然两者都是为了巩固政权,长治久安,董仲舒苦心经营了上有最高的“天”,下有载舟覆舟的“民”的理论(价值观),企图劝戒、限制“天子”,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天子却是至高无上的,生克制化的观念只是被利用来改朝换代或篡夺权力。

第三,对同一个对象,可以有对历史发展影响程度不同的多种评价标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价值中,我们认为唯古标准是至今仍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哲学上的“认知”,而是关于社会的认知。

综上所述,我们规定了本书的基本概念和讨论范围,以求在粗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过程中能较明晰地表述我们的观点。本书还将尝试把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置于新的社会系统进化观的理论框架中考察,根据新的社会系统进化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这种价值取向,从而对当前流变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整体是十分丰富的。本书仅从文化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加以考察。虽然我们有限的学力与论题涉及面之深广很不相称,但我们仍力图用典籍、历史和现实的材料从经验和逻辑上阐述我们的观点,

并且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的启发下试图确立我们对于社会的演化发展的新的价值观，以此来评价传统和现实，探求“旧邦新命”的祖国的前途。我们唯一的奢望是通过这本小书，能使关于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从而开展对此一问题的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至于从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以及思维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不是本书的任务和讨论的范围。

本书分十章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和当前流变趋势，从社会环境（外交）、社会目标、社会结构、社会认识、社会政治、社会成就、社会伦理、经济和人生等十个方面考察社会价值取向。这当然不是囊括了社会价值的全部内容，只是从文化史和社会学角度力图提供中国文化中社会价值体系的梗概。

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十个方面中，关于社会目标的价值取向在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中心，是有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从系统的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以及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是社会系统封闭或开放的前提。不同开放程度的社会系统可以大致分为封闭和开放两种形式，从而，系统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又分为近平衡态和非平衡态。前者可称为封闭近平衡态社会系统，后者可称为开放非平衡系统。这两种不同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各种功能——运动和调节，复制和稳定都围绕着社会系统的目标，规定着社会系统的行为。如封闭近平衡态的中国传统社会，其目标是非进化的固定点，表现为“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这固然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式层级结构和强干弱枝的大一统结构相适应的，反过来，这个目标便成为这个社会系统的各种功能所趋向的焦点。其它的社会价值取向，如政治、经济、伦理、认知、人生、成就和家庭，都服从这个目标，从价值观念来说就是服从排斥进步和个性的和谐、稳定。如经济价值观方面的平均主义和儒家民本思想；社会认知方面的唯古取向和崇拜老人；政治价值方面的

仁政德治；人生价值方面的扼杀个性、发展内省修身，都是向着天下太平的目标价值聚焦。反之，开放非平衡的社会系统由于其目标是在系统开放形成的非平衡势态中不断进化，不断选择的，因此围绕这一目标价值而产生的各种社会价值观，都具有开放的多元的和进化的特点。围绕社会目标价值取向建立社会价值体系的概貌，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一个尝试。

(二)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再认识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生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转折，历史的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正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预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①随着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传统的惰性和旧体制的结合所产生的阻力越来越明显。

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悲剧，七十年代末以来，理论界重视了对封建主义传统的批判，但这种批判针对的只限于“封建主义残余”。这个概念是基于如下认识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时被推翻了，作为封建主义社会基础的宗法社会也已经在民主革命中被彻底摧毁了，因此，封建主义只是“残余”，而且“残余”只是指对社会进步起消极作用的东西。至于这种“残余”的实质，它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都未能得到具体的研究。

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中，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是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